

中国经济新时代的“五双”特征

■ 梁启东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时代特征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2008年金融危机做一个拐点,一个转折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是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等等,这几个化大趋势没有变,但是在总的趋势之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时代特征我体会五个“双”。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在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遇到了“双”保护。经济发展全球化,中国很受益。改革开放30年增长最快的后10年是靠开放,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我国是第五大工业制造国,现在实际上是第一大。2001年的时候经济贸易排第五六位,现在是第二位了。2001年是全世界最大投资人了。特别是工业产品我们现在进步很大,几乎快达到工业品产量第一位。总体上来讲,我们得益于经济发展全球化,但在经济发展全球化大背景下,我们面临国际发展背景很大,一是贸易保护,二是投资保护。贸易保护,经常看到管道出问题了,不锈钢出问题了。我们辽宁的草莓把欧洲市场占领了,现在全被撵回来了。还频频发生反倾销反补贴的问题。现在贸易争端和保护的趋势愈演愈烈了,已形成了狂潮,主观原因是我们的腰杆子越来越粗了,气场大了。另外,国际上需求萎缩,出现

问题了。贸易保护也有投资保护,尤其是奥巴马后期,日本从2006年从大陆撤资,现在美国也在撤资,尤其对北方地区。大年初一市长就招商引资,压力是相当大的。对于我们典型的北方的投资地区来看,影响是相当大的。

第二个特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双约束,即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我们国家的资源比较贫瘠,资源已经越来越少。举个例子,我们为了维持70%到80%全球钢产能,现在每年进口70%到80%的铁矿石,结果连续五六年涨了5点多。我们钢铁企业三年基本上没有利润。钢铁行业占辽宁25%,现在是20%,几大钢铁连续亏损,一年一亏损好几十个亿。这个非常可怕。本来是传统的大支柱产业,现在都亏损。现在钢铁行业挣钱基本没有,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很难很难。辽宁是产能大省,现在严重缺能源。原材料的约束,我们能耗是现在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这是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就不用说了,环境污染很严重,环境承载力压力相当大了。

第三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需求双过剩,一个是产品产能过剩,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目前低端产品过剩很多。现在难在哪儿呢?所谓高新技术产业,现在有些政府主导的项目,引进大项目,包括光伏项目,基本上是垮得稀里哗啦。这种产品过剩不要紧,关键是地方政府投资过剩。与产品产能比较,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过剩更可怕,引发了我们一系列的泡沫经济。2007年的时候,我们住房改革像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一样改错了。

第四个特征就是高成本时代,我们制造业面临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增长,我们是低成本,进入今天我们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一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至少是10%以上。现在建筑行业,要工资是极个别的现象了,现在工人的时代倒过来,而且每天按天算工资,按小时算工资。一个好的建筑工一天工资是600到700元,稍微差一点的也有300元钱。二是原材料成本提高了。三是环境成本提高了,原来PS项目现在不能搞了。四是企业社会成本在提高,富士康从反面证明了,企业使劲剥削不好使了。五是土地成本提高了。六是国际成本提高了。最后一个人人民币是升值了,利息成本也在提高。上述这七个方面,证明我们逐渐进入高成本时代。我们中国制造逐渐被越南制造、印尼制造代替了。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引领世界的居民能不能维持下去?

最后一个是经济发展动力上的双驱动。一个是工业化驱动,一个是城镇化的驱动,这两个驱动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尤其是城镇化。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员,也是中国当今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伴随着中国快速增长,我们还有四五

亿人口要进城。

根据上述五个判断,我觉得在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时候要把握这么几个关系。一要处理好投资消费的关系,既要注重消费,也不能忘了投资,也不能以偏概全。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地区内,尤其是总量扩张型的阶段,像广东是结构调整型的阶段,总量扩张型的投资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利用外资投资可能更有必要;二是既要重视内需也要重视外需。辽宁沈阳内需比较热的时候,出口一直是负数;三是既要重视新兴产业,也要重视传统产业。这个传统产业,在辽宁这个地区,现在钢铁占了二十几个百分点,这个现实改不了;四是既要重视服务业,也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五是既要重视重工业也要重视轻工业。东北轻工业比较差,基本上没有轻工业;六是既要重视二三产业,也要重视1.5产业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业,即农业工业化;七是既要重视资本技术密集型,在一定地区,尤其是投资大省地区,也要重视劳动密集型;八是重视大企业,也重视小微企业。十八大讲三个平等,尤其把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概念解决了,以后对地方发展民营经济,落实两个36条效果非常明显;九是既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又要结合城镇化和区域布局,把生产力结构布局要做好。最后,既要重视实体经济也不能忘了虚拟经济。十八大突出讲实体经济,把它作为坚实基础提出来了。美国是虚拟经济过度,玩过火了。

最后一个是经济发展动力上的双驱动。一个是工业化驱动,一个是城镇化的驱动,这两个驱动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尤其是城镇化。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员,也是中国当今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伴随着中国快速增长,我们还有四五

如何加速工业经济结构调整

■ 余涛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

加快公益机构战略性调整,是顺应当前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必然的选择。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从整个全球来看,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一些不确定因素也还存在。而且从各国发展情况来看,经济的下行压力风险仍然在加大,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生产要素流动的存储对中国制造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工业的结构性战略调整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在工作过程中我们有几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第一个体会,全球整个生产要素开始向亚太地区重新加速转移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我们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参与10加3,就是东盟加中日韩;还有10加6,东盟加中日韩加日新澳。此外,美国提出亚太地区PPT,就是亚太经济合作伙伴协议。现在东盟地区,东盟国家,为了主导亚太的发展,也提出了RCEP这个协议。在整个过程中,大家一是看中了亚太地区的发展,同时,在亚太地区发展过程中也在争取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比如,我们在前一段时间TC-CT的时候,也参加中美投资保护性谈判,在整个过程中,有一个跟踪美国2012年投资保护谈判的文本,有几项东西对我们产业化和工业化发展,以及工业安全问题带来很大的挑战。这里有几个新的概念。首先,WTO里面有一个待遇,所有跟美国谈成投资保护协定,谁先谈成,将来再跟美国谈判,先谈成的可以享受后面的规则。我们认为,条款设计是比较科学的,这样可以鼓励跟美国最先谈成VIP,可以适用于后面的规则。即便后面的不能适用于前面的,如此也可鼓励各国跟美国加快谈成投资保护协定,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挑战。其次,准入前的待遇问题。我们原来在跟各个国家谈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只是谈准入后,这样我们通过外商企业投资指导目录对外资进入中国投资有了限制。如果按照这个许可,准入前就实行国资待遇,各国不能对准入前加任何许可,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制约。再次,负面清单要求所有国家对于自己认为这个领域或者服务部门不能开放,就在附件中列入负面清单,一旦列入负面清单,就意味着未列入负面清单的东西一律对外进行开放,这

对我们提出了挑战。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历史跟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不像它们那么到位,我们列入负面清单的局限于我们的认识,将来我们回过头找这些东西,对我们有约束。所有这些东西对我们整个工业发展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体会,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对全球资源背景进一步加强了。这里面有几个挑战,第一个对传统的关税,体现主权特征的关税的问题带来了挑战。因为我觉得,过去在很多谈的时候以关税作为我们主权的体现,而跨国企业在配置加强以后,把这种传统给你削弱了。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量贸易区的发展和保税区的设置,其实都在服务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配置问题。第二个对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产生问题,为什么很多工业发展方面,总不能列升到价值链的上头,在全球潜规则底下,无形的手已经把你们定义在底下,这个东西对我们产业结构带来了挑战。

第三个体会,当前如何进一步增强对创新的引导。这些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像ipone产品加服务对当前工业化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求不断地创新技术,同时要求必须创新商业模式。技术实现了,没有好的商业模式,技术也不能够有好的应用。这对我们整个工业,从全球环境来说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次,加快工业结构调整也是中国工业发展到今天新阶段的必然选择。到现在为止,还存在工业发展核心技术缺失,尤其是产业过剩等问题。过去十年中国赶上难得的机遇,这期间恰恰是美国发生了战略性选择错误,中国恰恰选择了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把工业转移出去,所以实现了这十年的加速发展。带来什么问题呢?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中心对应的是全球整个需求,在全球需求整个经济上行的时候,过剩问题不显现,但是一旦全球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对于全球过剩产能问题就显现了。现在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仅仅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

如何适应当前的形势,加速工业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前不久召开了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会议,会议上定出来一些东西,我认为也是挺符合当前情况的。这里主要有几



点。一是要优化现代产业,我们整个产业是对应全球经济上行的产业,现在适应新的发展时期,如何处理好工业较快发展问题?首先要优化存量,包括十八大提出的提升制造业,淘汰过剩产业,节能减排等等,都是优化的一个具体举措。我非常赞同强化需求激励机制的观点,尤其是这里有深层引导需求的作用。但是生产和需求到底是什么关系?政府在这方面有积极因素,应该还是需求为主导,来引导生产需求,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的供给。其次,要处理好增量问题,包括发展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等等。再次,适应新形势,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环境是非常必要的。这

里首先是应该有良好的创新体系。我们原来到我国台湾新竹等地方,到瑞士、美国,我觉得它们创新体系非常健全,虽然投入不到位,起码对创新体系的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创新企业结合度,产学研结合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海外好的经验。第二,实体经济是基础,其中,中小企业又是基础,国家应该下大力气创造良好的环境,来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力和创业。第三,在当前形势下应该进一步加大劳动力数量培养。现在入市10年以来,中国走了一段工业发展的路,到了新时期,在新的环境下,尤其在这种技术变革的条件下,应该进一步催生中国劳动力的数字。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产业层次提升与升级

■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光是内部比例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数字的提高和产业升级本身的层次提升和升级的问题。所以,产业升级和国民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产业升级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价值链的攀升,第二个层面是技术的换代升级,第三是创建新兴产业或者是战略新兴产业。对中国来讲,产业转型和升级从来没有这么紧迫过。在迈克·波特《竞争战略》这部著作中,他把后发国家分为四个发展阶段,都离不开这四个阶段,就是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以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的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要素驱动廉价资源、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靠这一途径,完成了最初财富积累的阶段,在90年代中后期走到尽头。现在正在进行的投资驱动阶段,大规模投资驱动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投资驱动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产能过剩,二是通货膨胀。第三个驱动就是创新驱动。中国正处在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这个转型是艰难的,是惊险的一跳。创新有两种模式,一是自主创新,第二是模仿创新。美国是自主创新,日本和韩国,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是模仿创新。中国要是走创新驱动,也许模仿创新更现实一点,自主创新是理想,在中国很难实现。很难实现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种相对不够科学的教育制度,第二个是高仿造的危害,第三是知识产权不能够得力,这三个方面决定中国走自主创新很艰难。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通过财富驱动来谋取国家或者地区的竞争力,我觉得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注定是要下降的。

在中国通过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升级不光是发展服务业的问题,还有空间布局的问题,这个空间就是要走服务业集聚化的道路来推动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的集聚空间分布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原则上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来走产业集聚发展的道路。第一个阶段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区的高度集聚,第二阶段是生产性服务业在郊区试探性的随意分布,第三个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郊区分布开始在空间上较为明确,在郊区的交通节点上开始集聚。第四个阶段,伴随着郊区化的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在郊区形成集聚进一步巩固。

以江苏常熟案例做一个简单的剖析。常熟经济是80年代就开始发展,产业相似度,规模优势和集聚效应不够明显。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推动下它迅速崛起,财政收入130多亿,人口只有120万左右。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推动必须有新的载体和支撑,无非两个选择,第一个走高端的制造业,第二个是走现代服务业。我这次去看了它两个园区,其中有一个东南园区,现在把它做成高技术服务业园区,引进了一些科研院所和跨国公司总部的研发中心,比如说丰田汽车研发中心,网络信息科技服务业,也有夏普、住友等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开发区全力打造科技引领的现代高端服务业。沙家浜旅游景区很单调,就是革命老区,现在把影视城引进来了,向立体化的、多业态的多方面拓展,把旅游产业提升了。常熟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升级有几个经验,概括起来:第一点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主要通过现代服务业来代表基本现代化的实现,包括发达经济、高品质生活、优美的环境,至美化的城市,发展基本的中东服务体系,这几个方面与现代服务业息息相关的;第二要迈上一个新台阶,突破原来瓶颈,需要现代服务业来支撑;第三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来打造良好环境。我们知道服务业发展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良好制度环境,第二个是人力资本。这两个方面正在努力做。据我所知,利用这个城市化的背景也吸纳了大中城市的部分研发中心和人才。第三做县域经济,当然要跳出县域经济来发展自己的服务业,走双向发展的道路,日后走产业和空间的集聚,这是他们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经验。

名家观点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复旦开讲“中国经济发展导向”

“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补贴和限价只能是权宜之计”,“精简机构,不简政,是精不了兵的”……他用形象的言辞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作了生动诠释。

成思危指出,政府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不能违反市场经济三个基本规律:一是价值规律,二是供求规律,三是竞争规律。说竞争吧,像那些先占有市场的企业,肯定不希望有新竞争者加入,“就像挤公共汽车,那块上车的踏板成了‘变心板’”。他指出,有新的市场参与者想

“企业进入市场就像挤公交车,那块上车的踏板就是‘变心板’,一踏上车就希望别的人不要上来了;精简机构之后往往反而出现机构膨胀,这头减少了人员,那里又借调……”日前,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复旦大学进行题为“中国经济发展导向”的讲座。

进入为什么不可以?只有高水平的进来,才能淘汰低水平的,所以防止重复建设的说法不对,应该是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我们不能用宏观调控来保护垄断,而应该鼓励竞争。

他说,市场的问题非常复杂,出一个政策不见得能够考虑完全周到,“任何政策都会有漏洞,最近离婚现象增加,就是说明政策有漏洞”。

成思危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任何社会都是指令性经济和市场

经济的结合,都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方面起作用,关键在于“度”。“我们从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很长一个过程中,一直是‘强政府、弱市场’局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就要把以前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手撤走。他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精简机构后却反而会出现机构膨胀。他指出,精简机构,不简政是精不了兵的。职能部门管的事太多,哪怕减少人员,之后还要借调来。应该要分析,有的事到底该不该管,做对的事比把事做对更重要。(解放日报)